

■ 学科史与学科基本理论

DOI:10.15998/j.cnki.issn2097-6763.2026.02.009

社会科学领域“文献研究”的 合理性辨析与再定位



武建鑫¹,魏丽娜²

(1. 陕西科技大学 文化与教育学院, 西安 710021;

2.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院, 杭州 311121)

摘要: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文献研究”虽已作为一种基础性研究方法被学术界广泛应用,但其方法论内涵仍缺乏明确的理论界定与范式建构。当前学术共同体尚未就其学理正当性达成共识,相关方法论争辩持续引发跨学科学者的深度关注与批判性对话,这一现象折射出有关文献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复杂性与动态演进特征。现有批判多从研究范式和文献综述的角度,否认文献研究作为一种方法的合理性,进而从建构性视角提出“研究整合法”,并将其视为一种文献综述的可行方案。然而,这类判断及其论证缺乏对文献内涵的一致性理解,将文献研究等同于文献综述,以外在的研究范式作为评判标准,从而得出文献研究不能称其为方法的结论,这在逻辑上不免失之偏颇。基于此,有必要回归文献研究的基本立场,从中英文语境中溯源文献的内涵及其表达,客观分析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角色差异,在回应文献综述与文献研究认识误区的基础上,用文献研究来指称一切基于文献的系统化研究实践,进而从研究方法体系入手来探讨文献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研究范式归属、研究方式定位及具体研究方法与技术。研究表明,文献研究指涉的内容明显超越具体研究方法的操作性规范,具有非介入性、无反应性和便捷性等研究特点,其独特的研究理念、价值取向和复杂的表现形式决定了研究方式的定位合理性。在研究实践中,文献研究的有效实施需要辅之以文献研究设计、文献评估支持和文献分析过程3个关键环节的立体化支持。

关键词:文献研究;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方法论基础;研究方法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0;C1;C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6763(2026)02010222

修回日期:202506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教育学西部项目“中国西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与产业结构协同适配机制研究”(XIA250361)

作者简介:武建鑫,男,甘肃武威人,陕西科技大学文化与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学科建设与学科评估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魏丽娜,女,云南昭通人,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工程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研究。

引用格式:武建鑫,魏丽娜.社会科学领域“文献研究”的合理性辨析与再定位[J].重庆高教研究,2026,14(2):102123.

Citation format: Wu Jianxin, Wei Lina. Rationality and repositioning of “document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6, 14(2): 102123.

一、问题提出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文献研究被学术界视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超越时空限制进行非常广泛的社会议题研究,还可以通过文献来把握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1]。因此,有学者指出,文献研究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方法之一,更是研究者开展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功^[2]。以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学位论文为例,方法应用统计显示高达93.71%的论文作者宣称采用了“文献研究法”(或“文献法”“文献分析法”),且在文中陈述了对文献进行阅读、分析时所遵循的科学规范与严谨态度,或在文献综述部分详细阐述了检索、收集、整理及撰写文献综述的过程^[3]。然而,这一普遍应用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文献研究”在方法体系中取得了胜利。一个明显的反差体现在研究方法类教材中对问卷调查、访谈、观察、实验等方法的探讨十分详尽,但对文献研究的内容涉及较少,甚至付诸阙如。另外,在学位论文的答辩过程中,从早期评审专家在答辩现场对文献研究法成立与否争论不休,到后来各位专家对此现象选择集体性沉默乃至忽视,这并非说明争论消失抑或不需探讨,而是隐含有文献研究法的复杂性,亟待科学深入的论证和建构。由此可见,文献研究繁荣的表面实则暗藏方法论层面的失据。

近年来,随着学术共同体对研究方法规范化要求的日益提高,文献研究正面临深层次的学理性质疑。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姚计海于2017年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发表《“文献法”是研究方法吗——兼谈研究整合法》(以下简称“姚文”)一文,基于思辨与实证研究范式的分析,探讨文献综述的特点及其与研究方法的关系,指出研究方法应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独特性,所谓的“文献法”不属于研究方法的范畴^[4]。“姚文”可视为首次对文献研究作为一种方法的合理性进行系统性质疑,同时创造性地提出“研究整合法”这一基于文献资料的实证研究路径,并论证其对提升教育研究质量、推动学科发展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性。“姚文”自发表以来,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截至2025年12月8日,该文累计下载10813次,被引197次,引用文献中有152篇来自硕博学位论文。然而,“姚文”的出现并没有终结学术界对文献研究法的争议,反而引起广大研究生群体的讨论和自省,且参与者讨论的热度越来越高。例如,“文献法是真实存在的研究方法吗?”^[5]“对不起老师,我的论文用了‘文献研究法’”^[6]。在这之后,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如肖军将文献法视为一种以证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法,既可以是定量的方法,也可以是定性的方法^[7]。相比较而言,近期《比较教育研究》发表的两篇论文更为典型。其中,丁瑞常等从为何误解、如何误用,以及何以规范化层面更新了文献法的认识和操作规范^[8],林杰等从文献法的价值、问题和改进策略3个方面作了回应^[9]。然而,相关论述囿于比较教育学科视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献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的整合性价值呈现。

总体来看,学界围绕“文献研究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既反映了文献研究的定位及其合理性仍然存在争议,也体现了学术界对文献研究方法论探讨的集体自觉。然而,已有论证仍然存在些许偏颇,相关判断依据缺乏合理性,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基于此,本文将研究主题回溯至原命题“文献研究”,重点聚焦“姚文”及相关研究的论证依据,结合后期多位学者的反思性探讨,从文献、方法论、方法体系等多个维度探讨文献研究的合理性,进而从建构主义视角继续完善文献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可能性,并以此求教于学术同行。

二、“文献研究”作为一种方法的合理性存疑

在既有的学术探讨中,“文献研究”被视为一种方法的论证基础多种多样,从聚焦文献综述到研究范式的审视,再到具体学科的方法界定,都在证明文献研究法的合理性。然而,相关结论却存在逻辑上的漏洞,难以获得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共同体的广泛认同。

(一)将文献法等同于文献综述,转移了论证的关键议题

探讨一个概念的特征及其延伸意义,明确其内涵是所有工作有效开展的逻辑起点。因为在沟通过程中,同一个名词往往在不同群体和语境中有不同的指代对象及其内涵。从这个层面来看,要探讨“文献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否合理,就必须先明确何谓“文献法”。“姚文”在开篇就对“文献法”作了界定,“文献法”也可称为“文献综述法”或“文献研究法”,主要表现为在撰写文献综述时,对收集和整理的一些以往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描述性分析与概括,并以此作为提出研究问题的基础^[4]。然而,常规的文献综述不具有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其本身并不属于研究方法的范畴,这显然是把给文献综述的“板子”打到了文献法身上^[8]。这里的“文献法”被视同为“文献综述”,并且作者也阐释了“文献法”在文献综述过程中的操作程序。从此文首段的论述语境来看,作者是从关注当前学术研究实践现象出发,引出“当前,在教育研究文献中……经常看到有研究者在研究方法部分强调使用了‘文献法’”这一客观事实。换句话说,“姚文”将“文献法”视为“文献综述”并非主观为之,而是该研究的初衷就是要批驳指向“文献综述”的“文献法”。基于此,“姚文”在对“文献法”的论证中,均以“文献综述”来指代,并在文中强调“文献综述在教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是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否认了“文献综述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献法’”。紧接着,作者对“文献综述”和“文献法”做了功能性区分,认为“文献综述的质量不决定研究目的的实现,而研究方法则决定是否能实现研究目的”,仅凭撰写文献综述就认为使用了“文献法”,这是不成立的。应该说,“姚文”对文献综述和文献法的区分是有必要的,且具有合理之处。然而,这一论证逻辑仅符合学术界对实践中“文献法”错误认知的批驳,却忽视或回避了“文献法”的客观实践乃至应然之义——既没有从国际视野反映“文献法”的研究实践,又没有从本体论回应“文献法”应该如何界定。正因为如此,“姚文”的主要结论“‘文献法’不属于研究方法的范畴”在逻辑起点上缺乏严谨的事实依据,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将研究范式纳入判断标准,不符合研究方法的论证逻辑

判断“文献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否合理,一个不证自明的论证逻辑就是从研究方法的判断标准来审视“文献法”。当然,“姚文”也运用了这一论证逻辑,首先从宏观层面陈述了研究方法体系中研究方法的具体内涵,然后系统阐述了教育研究方法的三大特征,从科学性、系统性和独特性3个方面否认了“文献法”作为研究方法的合理性。然而,论证逻辑上的恰当仍然无法掩盖作者用“文献综述”指代“文献法”的客观事实,因此,“‘文献法’不属于研究方法的范畴”这一结论仍然无法获得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姚文”将“研究范式”纳入判断标准,提出“要明确‘文献法’是否为一种研究方法,有必要先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范式加以梳理,了解此问题背后的研究范式之争”^[4]。事实上,研究范式无助于回答“文献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即使用研究范式的标准来否定“文献法”,其结论也难以站得住脚,原因如下。(1)范式和方法在方法论体系中不属于同一个层次,范式是研究者观察世界的思想窗口,而方法是研究者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取的措施、步骤、程序、技术等等的总和。很显然,用研究范式无法判定研究方法的合理性问题。(2)社会科学有许多相互竞争的研究范式,这些范式有不同的预设、想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技术和科学研究范例,如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符号互动、批判理论、阐释学等范式^{[10][17]}。如果将当前科学研究领域的基本范式分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这种“一分为二”的类型划分尽管在广大学术共同体的日常交流中广泛使用,但在科学研究层面略显粗糙。(3)尽管实证主义范式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位置,且已成为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但“姚文”所谓的“思辨范式”并非没有价值,相反,其对人们如何创造与维持他们的社会世界有所理解并给予有力的诠释。

“姚文”基于“‘文献法’具有思辨研究的性质”这一前提,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提出“撰写传统意义上的文献综述而采用的所谓‘文献法’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方法,不具有实证研究的特

征,缺少系统规范的、具有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和工具”^[4],这一论证逻辑显然放大了实证主义范式的价值功用。在方法论层面,非实证的未必就是不合理的,也未必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方法。为此,林杰等提出文献法具有确定性和模糊性二元特征:确定性体现为文献研究可以转化为一系列具体研究技术和程序清晰的研究路径,模糊性体现为文献研究在处理复杂问题和跨学科研究中展现出极强的适应性和创新潜力^[9]。事实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范式之间没有对错之分,也没有范式的更替,只有因立场不同而造成的范式之间的竞争。文献研究需要用研究范式来审视,但并不能将其视为能否成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判断标准。

(三)将文献法限定在具体学科,忽视了其在方法体系中的定位

从有关文献法的论证中可知,大部分学者往往以不言自明的方式默认该方法适用的学科领域。例如,“姚文”的论证中教育学学科痕迹较为明显,丁瑞常^[8]、林杰^[9]等均明确限定其论证的视角为比较教育学。将文献法狭隘地限定在比较具体的学科领域,模糊了其在研究方法体系中的核心定位。这种学科化倾向常将文献法降格为一种特定操作技术——聚焦特定学科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综述。然而,文献法的价值远超于此,它应被视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基础性的元方法,其核心在于系统性地利用既存文献作为研究素材,为理论构建、历史追溯、观点论证或现象阐释提供核心证据链。无论研究主题是教育政策比较、历史社会变迁抑或经济模型推演,系统获取、批判性分析与创造性整合文献的能力,都是研究得以成立并深化的底层逻辑,而非某个学科的专属技艺。这种学科限定更深层的弊端在于,它掩盖了文献法在方法体系中的关键定位。其究竟属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类型?当文献法被窄化为学科工具时,其作为核心研究方法的地位遭受质疑,将文献法等同于资料搜集手段而非贯穿问题提出、理论对话、证据构建和结论推导全过程的系统性分析程序。另外,学科化的视野无法涵盖这种定位的复杂性,将文献法简化为一套静态规程,忽略了其在不同研究设计中所能承担的多元角色,即从辅助性证据上升到主导性知识生产方式。

因此,超越具体学科的藩篱,将文献法的论证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科学视域,在整体研究方法论的框架下重新审视文献法至关重要。近期我们也发现由姚喜双等撰写的《文献分析法是研究方法吗?》在论证过程中处处体现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对理解何谓“文献”、文献的研究定位,以及文献分析法的判断标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1]。但较为遗憾的是,此文的论证走向了文献评价类型学的阐释,并未从方法体系中回应“文献分析法”的恰当定位。忽视这一根本定位,仅在宽泛意义上进行技术性讨论,不仅削弱了文献法的理论深度与方法论自觉,更阻碍研究者充分释放其作为知识生产引擎的潜能。总的来看,文献研究的力量,在于其跨越学科界限的普遍适用性与认识论深度。若拘泥于学科牢笼,抑或缺乏论证的锚点,则无异于舍本逐末。

三、准确定位“文献研究”的认识论基础

学术界对“文献研究”的认知处于混乱的争议状态,根源在于对文献法的探讨尚未达成科学统一的认识基础。为进一步明确有关“文献研究”的定位,我们必须回答何谓文献、文献在社会研究中的角色差异,以及如何看待文献综述,然后才能进一步聚焦研究方法的判断标准。

(一)文献的内涵界定及其一致性建构

在社会科学领域,概念界定具有重要的价值。相较于一个由组合词汇构成的概念,元概念更重要,它是诸多词汇进行延展性分析的逻辑起点。何谓文献法同样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对文献法的不同理解主要源于对文献的认知差异。有关文献法争议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何谓文献。一方面,在中文语境中表达文献的语义过于窄化,且在不同情境中的指向有所差异,如在文本分析研究过程中用“文本”来代替文献;在研究方法教学实践中用“论文和著作”来代替文献;在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的学术交流中,通常将文献、情报、信息、知识等专业词汇置于同一个语境中使用。另一方面,在中西语境中,文献的语义差异较大,文献研究的表述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然而,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最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文献法需要跨越中西语境差异,对文献的语义达成一致性理解,从而促成学术共同体在研究方法层面进行无差别的学术交流。

在中文语境中,文献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其释义因时代变迁发生过很大变化。从词源来看,文献始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2]有学者考证,在词汇“文献”语义流变中,对“文”的典籍认知较为统一,但对“献”的理解产生了3种分化解释。第一种解释为“献贤相当”,即“献”通“贤”,直指掌握礼乐典章的智者群体,如《论语·八佾》郑玄注,“献,犹贤也”,强调知识载体的人格化,即在文字记录尚未完备的早期文明中,耆老宿儒通过口传身授保存历史经验与制度规范^[13]。此时“献”与“文”(典籍)构成互补关系:贤者之“献”为凝固的“文”注入动态阐释力,“文”为零散的“献”提供系统化依据,二者共同维系文化命脉。第二种解释为“仪献古通”,即“献”与“仪”相通,如《周礼》“献酌”郑司农注,“献读为仪”,指向承载礼法精神的仪式器物与行为范式^[14]。青铜礼器铭文、祭祀乐舞、朝聘仪轨等,皆是以物质形态“凝固”的礼制实践,此类“献”实为制度文化的非文字性记录。在此维度,“献”超越口语传播,成为可观测、可操作的制度性文本。第三种解释为“献言近义”,即“献”本义为“陈献”,如《说文解字》,“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引申为主动呈现有价值之言。无论是贤者论道,还是臣僚奏议,皆是通过“献言”将个体智慧纳入公共知识库。此解揭示了“文献”的核心功能——经由系统性言说,使隐微之识成为可传播、可批判的文明积存^[11]。

很显然,通过对“文献”的中文考据,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文献”的原初意义和发展流变,即贤者通过仪式化实践传递精要之言,最终与典籍之“文”融合为完整的文明记忆。尽管当前各类词典均对“文献”一词给予严格的界定,如《辞海》将“文献”解释为“记载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但这类统一精简的词汇界定无法体现文献研究必须回归人、物、言互动的立场域。

在英文语境中,表达“文献”概念的两个主要术语是 document 和 literature,二者含义存在差异。根据牛津词典释义, literature 主要有两层含义:①书写的艺术作品,尤指小说、戏剧和诗歌(区别于技术性资料、报刊、图书等);②围绕特定主题或学科的出版物及信息印刷品。document 则指:①提供信息或作为证据的官方文件、书籍或电子文档;②包含标识名称的计算机文本文件。尽管中文均可译为文献,但用法存在细微差别。 literature 作为集合名词,通常无单复数形式,特指某一学科或主题的书籍期刊类资料,如学术论文末尾的“参考文献”即用此词。document 则涵盖更广泛的记录载体,包括碑文、古币图文等非印刷品。在指代历史性文件时,document 可依据数量使用单复数形式(一篇或多篇文献),该用法在社会科学著作中尤为常见。鉴于这两个词的差异,在将中文翻译为英文时需要格外注意。例如,《教育政策文献汇编》的文献一词,既可翻译为 documents,也可翻译为 archives,但绝不能翻译为 literature。事实上,权威的《ALA 图书馆和情报学词汇表》中也只收录了 document, literature 无独立条目,而以组合词 literature search(文献检索)的方式出现。总的来看, literature 只是 document 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属于狭义的文献界定,而 document 则属于广义的文献界定。

在学术界,学者们在分析文献时常用 document,但不同学者从多学科视角放大了 document 的某一特征。其一,将文献视为物质载体。德国文献学家沃尔特·舒尔迈耶(Walter Schuermeyer)说:“今天,大家把 document 理解为扩展我们的知识的任何可用于研究或比较的材料基础。”^[15]其二,将文献视为证据。苏珊娜·杜普伊-布里特(Suzanne Dupuy-Briet)认为,document 是保存或记录任何物理或象征的符号标记,旨在表示、重建或展示一种物理或概念现象^[16]。document 不应该被视为与文本有关,而应与获得证据有关。在她看来,作为证据的 document 具有以下特征:①有物质性,具有物质载

体和物理符号;②有意向性,目的是将物质载体视为证据;③这些物质载体必须经过处理,它们被加工之后才成为 document;④有一个现象学立场,这些物质载体被认为是 document。其三,突出文献的精神维度。唐克·杜伊维斯(Donker Duyvis)认为,document 是一个被表达思想的存储库,它的内容具有一种精神特征,外部形式的生硬统一会对内容产生影响,使内容丧失个人化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将标准化的形式和布局等活动限制在不影响精神内容的范围内,并消除真正不合理的多样性^[17]。其四,集中反映文献的平面微观意蕴。印度学者希亚利·拉马姆里塔·阮冈纳赞(Shiyali Ramamrita Ranganathan)的学术思想通常富有形而上学色彩,然而在界定 document 时,他却采取了一种看似狭隘的实用主义立场。他强调,文献必须被记录在便于物理操作或长期保存的载体上,甚至应该记录在一个大致平坦的表面上^[18]。基于这一严格标准,他明确将广播和电视通信等视听材料,以及雕像、瓷器和博物馆里的材料展品,都排除在 document 范畴之外。其五,关注文献的物质文化内涵。保罗·奥特莱特(Paul Otlet)认为,document 是指一切本质上是纪实的,为保存知识、开展科学和教育而收集的物质载体,如博物馆、橱柜、标本、样本等收藏。很显然,把这类物质载体视为 document,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物质文化”特征^[19]。

上述讨论为理解 document 的概念提供了基础。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较早提出一个常识性定义,认为 document 泛指任何具有物理形态的书面文本,涵盖书籍、论文、手稿、日记及会议记录等。坦尼娅·菲茨杰拉德(Tanya Fitzgerald)和大卫·多洛维茨(David Dolowitz)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界定,前者纳入口头和虚拟形态的记录,后者主张将照片、绘画和录音材料也包含在内。针对定义的不断扩展,迈克尔·巴克兰德(Michael Buckland)在其 *What is a document* 一文中指出,信息物理形态的持续演变引发了关于 document 概念边界及其限定的探讨^[20]。为结束这种基于形态扩展的定义趋势,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在 2011 年提出一个更简洁且包容的定义,将其描述为对事件或过程的记录。

由此可见,尽管中英文语境下文献的具体语义表达存在细微差异,但其广义内涵具有高度趋同性,均涵盖以下 4 个基本要素:①所记录的知识或信息;②承载知识的符号系统;③存储符号的物质载体;④记录的技术或手段。因此,本研究将“文献”定义为记录知识及其他信息的一切载体。需要强调的是,在中英文互译时,需特别注意 document 与 literature 的关联与区分:document 应被视为涵盖 literature 的上位概念,后者仅为前者的特定子集。在中英文语境中,讨论基于文献的研究,方法论层面用 document 统摄 literature,以 documentary research 来表征一切基于文献的研究方式。当然,文献在社会系统中的价值定位及呈现方式差异较大,故在具体文献研究分析表述中,可根据文献类型的差异选择适切的表达,如档案分析(archival analysis)、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统计资料分析(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alysis)等。

(二)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角色差异

社会科学研究以理解、解释并预测人类社会行为、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规律为宗旨,致力于构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为解决社会问题、完善公共政策提供实证基础与理论支撑。为实现这一目标,研究者根据具体问题可采纳多样化研究策略,在此过程中,文献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并以多重角色渗透于研究的全过程,或作为证据来源,或作为资料基础,或作为知识治理单元等。

一是作为一种论证依据。对于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文献都极为重要,在最一般意义上可作为一种论证依据。正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前者是指要有材料能够说明论点的合理性;后者是指说话、写文章要讲理,遵循逻辑,阐述道理事理^[21]。在学术研究中,有时为了论证新观点,从已有文献中查找事实;有时为了批驳某种学说,从已有文献中寻找立场相反的观点;有时为了形成系统的认识,从相关主题尽可能全的文献中探寻各类学说的事实依据。可以说,没有文献的支持,学术研究

就等同于纯逻辑推理,其相关结论或观点就很难让世人信服。作为一种论证依据,文献必须具备以下特点。其一,要确切无误。材料必须来自原始文献,注明出处,字字皆可靠,句句有来历,不能满足于转引二手资料。其二,要慎用孤证。如果只用一份材料下结论,往往存在很大风险。只有从很多材料中归纳总结出来的结论,才经得起推敲。其三,要仔细分析。对收集到的文献,在运用时要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二是作为一种研究资料。文献作为研究资料在学术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使用方式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以文献为独立资料来源,通过文献内容透视社会现实,常见于社会学、历史学及人类学研究中。这类研究往往将文献视为承载社会事实的原始容器,强调通过对日记、档案、政策文本或媒介报道等材料的系统剖析,揭示其中所隐含的制度逻辑、文化实践与权力关系。例如,通过解读某一时期的民间书信分析家族结构变迁,或利用政策公文考察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在此类研究中,文献不仅是信息的被动记录,而且被赋予“社会镜像”的功能,成为研究者进入历史现场、理解群体行为与意义建构的关键通道。第二种将文献与其他形态资料结合,通过交叉验证构建完整证据链,常见于管理案例研究、政策评估或多方法交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在社会科学研究设计中,文献通常与访谈、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等产生的资料共同构成研究的经验基础,但其价值需通过数据资料的“三角互证”得以实现。例如,在一项企业战略转型的案例研究中,不仅需要收集内部报告、年度报表和市场分析等文献,还需辅以高管访谈与员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不同来源资料之间的比对与互证,克服单一方法的局限性,提升研究结论的信度与效度。文献在此承担起锚定事实、提供背景和辅助解释的功能,它既可能作为主要证据链中的一环,也可能用于验证或补充其他方法所获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三是作为知识治理单元。信息资源管理学把文献视为同时具备物质载体与知识内容双重属性的动态系统,通过对其存储形态、知识管理、价值挖掘及传播规律的持续观测,揭示知识如何在社会记忆与即时需求之间循环再生^[22]。很显然,该学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无序激增的文献转化为可管理、可预测、可再利用的信息资源,进而发现文献存储、引用、增长、衰变的基本规律。在对这些规律的探索活动中,文献不再是静态的“被引用文本”,而是驱动研究设计、验证与创新的活性要素。更深层的角色转换在于,文献已从认识世界的“中介”跃升为“认识方式”本身。认识论传统路径依赖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与抽象,信息资源管理则通过大规模文本挖掘、知识图谱与模型训练,让知识世界直接生成对物质世界的可检验命题^[23]。例如,通过分析海量科技文献中的实验参数与结果,可在不进入实验室的情况下预测材料性能;通过追踪政策文本与社交媒体文献的共现关系,可提前感知城市舆情与治理风险。这种“用文献推导物质规律”的新范式,使信息资源管理学不仅管理知识,更以知识为仪器拓展人类认知疆域。

当然,文献在其他学术研究领域可能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里不再逐一列举。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对文献的遴选和运用均需遵循问题导向逻辑。为回应复杂的研究问题,研究者常需统筹类型、性质与功能各异的文献,使得多种文献角色在同一项研究中交织和共存,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学术实践。

(三) 文献综述须做扩展性理解

根据本文探讨的议题,似乎无须关注“文献综述”的相关问题,但若要从回答“文献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合理性来看,讲清楚“文献综述”在不同情境下的内涵指向及其与“文献研究”之间的关系又显得格外必要。一般而言,文献综述包含对文献的回顾、归纳、整理、分析和评论,反映到学术研究中,通常会以国内外研究现状、文献述评、文献回顾3种形式分别表示各自的用途。其中,“国内外研究现状”通常出现在学位论文中,意在尽可能充分地呈现论文选题在国内外学术界的进展,包括理论动态与发展脉络,进而明确既有研究的贡献、不足以及本研究可深入拓展的学术空间。

然而,伴随学术研究成果日益规范,学位论文中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撰写质量并未提高,并从“实质性要求”转向“形式化应付”,深刻反映了当前的研究生教育对学位论文中“国内外研究现状”写作规范培养的忽视或不足。“文献述评”通常出现在一篇完整的综述类论文中,主要强调对某一研究主题的“述”和“评”,特别是“评”的部分有助于廓清当前的知识图谱,进一步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选题和思路。这一类综述在国际学术界备受关注,通常是某一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撰写完成的,对相关文献有着深刻见解和整体把握,其成果对同一领域的研究群体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指引作用。相比而言,国内学者更加关心学术热点话题,对此类综述性论文不够重视。“文献回顾”往往是一篇期刊论文的一部分,出现在论文中“问题提出”之后,既有回答现有研究为解答论文选题中的困惑之义,也有为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或命题、建立理论分析框架提供知识基础之用。这类综述聚焦核心文献进行述评,较为简洁明快,常见于规范的实证类论文中。然而,上述分类仍然存在问题:一方面,3个词汇意义较为相近,在沟通交流过程中不易区分;另一方面,3种表述在学术规范层面无法实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性理解。

一般而言,文献综述是一个研究课题承前启后的关键要素,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再研究^[24],不仅表明前人研究成果已经做了什么,是如何做的,还反映他们还没做什么,哪些问题更为紧迫。应该说,已有的“文献综述”表达尚处于描述研究行为的阶段,是整个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与研究方法也并无关系,这已经成为学术研究惯例。然而,随着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一些特定类型的“文献综述”开始应用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如系统性综述、元分析等。这就使得在探讨“文献研究”时必须关注“文献综述”,以研究方法的视角来区分“文献综述”,并对其做扩展性理解^[25]。根据文献综述的目的性表达的不同,我们将文献综述分为“叙述性综述”(narrative review)和“规范性综述”(normative review)(如图1)。前者主要是为研究目的的实现做铺垫,对特定主题证据的定性总结,通常以非正式的、主观的方法来收集和解释研究成果,并倾向选择性地引用文献;后者本身就是研究目的,包括对有关初级研究详尽检索集中的研究问题,使用清晰且可重复的标准进行研究,对研究质量进行严格评估以及根据预先确定的明确方法整合研究结果^[26]。当然,“规范性综述”还可以分为“系统性综述”(systematic review)和“元分析”(meta-analyses)。“系统性综述”是一种采用预先设定、透明且可重复的流程,全面检索、筛选、评估并定性整合某一特定研究问题所有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旨在提供对该领域知识现状的全景式、批判性总结,并识别研究趋势与争议的方法^[27]。“元分析”是一种统计技术,通过合并多项独立研究的结果数据(效应量),利用特定统计模型产生一个更具统计功效和精确性的总体效应估计,以解决单个研究样本量小或结果不一致的问题^[28]。系统性综述和元分析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侧重于定性发现,而后者的重点是检验有关定量研究的因果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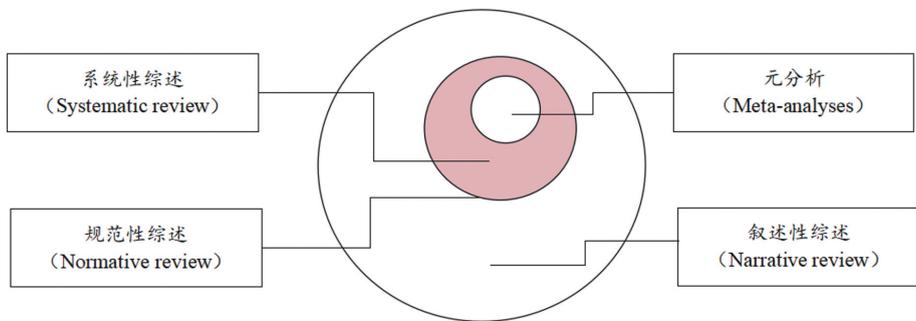


图1 文献综述类型划分

(四)研究方法及其判断标准

研究方法本质上是人类在探索自然与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发明的认知工具,旨在帮助我们客观地

理解物理、心理与伦理世界^[29]。然而,“研究方法”这一概念在应用中常被泛化甚至误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忽视其核心的可操作性特征,将诸多研究框架或范式(如“行动研究”“案例研究”“质性研究”“田野研究”)冠以“××法”或“××研究方法”之名^[30-31],并常与问卷法、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真正具有操作规范的方法或技术并列。这种命名方式模糊了方法论层级的界限,导致判断标准混乱。文献研究同样常被称作“文献(研究)法”或“文献研究法”,也成为此现象的一部分。偏爱“方法”称谓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方法作为认识工具和操作程序,能深化对事物机理的理解并提供问题解决路径,以“研究方法”之名有助于确立研究过程的合法性;其二,研究方法体系本身涵盖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多个复杂层面,多数研究者仅停留在运用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层面,对其发展脉络、理论表述及结构体系缺乏系统把握。因此,实践中只要工具能解决问题,研究者往往无意深究其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具体研究方法,也鲜会花费精力去辨析与确认其方法论属性。

事实上,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常用术语,以至于非必要不探讨其内涵。在相关教材中,研究方法通常被界定为在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理论、新观点,进而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工具和手段。很显然,上述定义属于描述性界定,充分彰显了对研究方法的功能概述,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认识论的深刻内涵,以致社会科学领域相当多的学术论文缺乏科学态度,没有科学地运用方法,仅停留在“表象性问题”的分析上,“研究”往往是一般经验性总结。从认识世界的角度看,研究方法是认识主体依据对客体发展规律的认识为自己规定的活动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人们实现特定活动目的的手段或途径,是主体接近、把握乃至改造客体的工具。在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Earl Babbie)的话语体系中,研究方法主要是关于“如何了解事物,而不是知道什么事物”的学问^[32]。很显然,这种解读更为简洁、深刻,也更具包容性。“如何了解事物”意在表明研究方法的核心是从此岸到彼岸的通道是什么,即实现研究目的的路径、技术、手段与工具。然而,这种极具解释力的阐释混淆了研究方法、工具、技术、框架和模型差异,不利于方法论体系的科学建构。事实上,研究方法有其独特的价值定位,判别某一研究手段是否具备方法论属性的核心标准,在于是否建构了完整的知识生产逻辑范式。

其一,真正的研究方法必须植根于特定的认识论基础,如实证主义驱动实验法对因果机制的探索,阐释学支撑民族志对文化意义的解读等。这种哲学锚定性使方法能够定义何种问题可被提出、证据如何构成以及真理以何种形态显现。其二,研究方法须具备自洽的逻辑架构,涵盖从问题提出、过程设计到结论验证的完整闭环,纯粹的技术工具仅能执行其中的片段化操作。其三,研究方法的本质特征还体现为范式的可迁移性,其核心逻辑可超越具体场景实现认知迁移,如实验法的“控制-比较”原则,既适用于实验室环境又能改造为自然实验。相较之下,技术工具的功能高度依附载体介质,网络爬虫脱离数字文本即失效。其四,研究方法更深层的判断基准在于意义阐释的自足性,即方法须具备独立的意义赋予能力。例如,内容分析法通过符号频次与关联规则揭示意识形态结构,而工具仅能捕获原始数据,技术仅能处理数据特征,二者均无法自主完成从数据到理论的认知跃迁。当剥离具体技术和工具后,若某种研究手段仍能凭借其哲学根基、逻辑框架与解释体系开辟独特的认识路径,则其方法论地位得以确立。例如,问卷调查在遵循抽样理论、量表效度检验及统计推论规范时,即从数据收集工具升格为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调查法;反之,若缺乏这些规范支撑,则仅停留在工具层面。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学术界尚未形成对文献研究方法的系统性认识,也很难用上述标准将其界定为一种研究方法。事实上,当我们紧盯研究方法的内涵及特征,并试图去理解其深意、把握其操作规范时,我们距离研究方法的系统性认识还很远。因此,需要一种宏观视角的认识论,即从研究方法体系入手,系统认识文献研究之于科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进一步确立文献研究在方法层级体系中的位置,以及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复杂关系。

四、“文献研究”的方法论及其方法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文献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得以明晰。接下来,本文将转向其方法论体系的核心问题:如何确立文献研究在方法体系中的位置,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建构其研究方法与技术体系。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体系分为4个层次,具体包括方法论、研究范式、研究方式和具体方法与技术(如图2)^[33-34]。一般来说,方法论观点影响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的选择,研究范式基本上规定了整个研究的立场、走向及其研究方式的选择,而相应的研究方式又规定了一套与其相适应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很显然,研究方法体系为我们全方位、多层次理解文献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也为确立文献研究的层次定位有着重要的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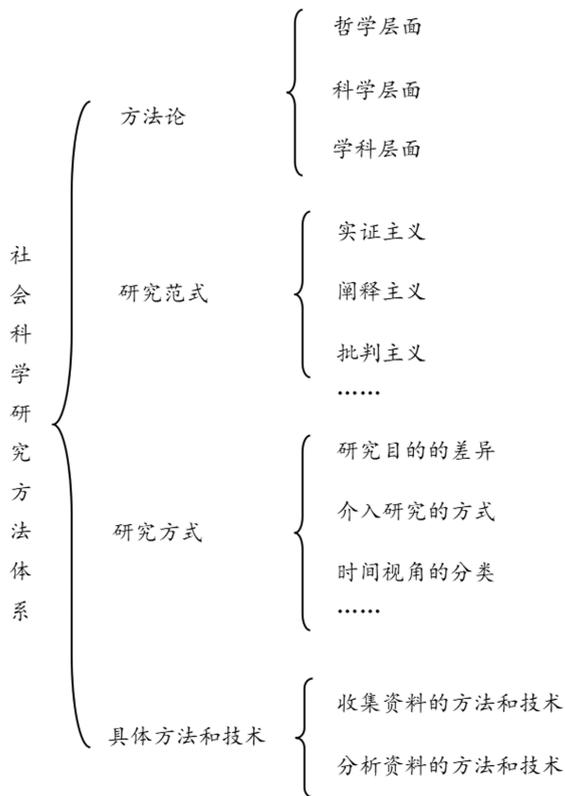


图2 社会科学研究的体系

(一) 文献研究与方法论

首先,从方法论层面来阐释文献研究的合法性基础和价值取向。目前关于方法论的阐述主要涉及哲学、科学、学科3个层面。

在哲学层面,方法论始终植根于特定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构成人类理解与变革现实世界的根本路径、策略及理论框架。任何学术探究都受到某种方法论(无论显性或隐性)的引导,它为研究问题的界定、方案的设计乃至具体方法的选用提供总体性原则与规范遵循。就文献研究而言,其哲学基础体现为将文献视为社会现实的可靠表征,承认文献作为特定历史与社会语境中的记录,能够承载具有认知效力的信息,从而反映某一时代或群体的观念结构和实践逻辑。文献不仅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还是人类认知与意义建构的观念性工具^[35]。基于文献的研究在认识路径上具有显著的开放性与便捷性。例如,通过解读个人回忆录,可以重构特定时期的社会转型经验;分析群体书信往来,能够揭示文化认同与交往结构的特征;借助官方统计资料,可以切入宏观社会问题的深层机理。因此,基于文献的研究不仅拓展了认识世界的方式,也体现了从文本走向语境、从表征窥见实在的认识论追求。

在科学层面,方法论的核心旨趣在于确立研究过程的规范与原则,以保障认知活动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就文献研究而言,其科学属性并不体现为对某一具体方法操作的推崇,而在于系统论证该研究方式何以能够产生具备解释力和可信度的结论。首先,文献被视作可检验的经验对象,其物质形态、生成机制与传播轨迹构成客观的分析基础。通过系统搜集、筛选与批判性评估,文献得以转化为可公共验证的证据单元。其次,文献研究须遵循社会科学的基本立场和研究规范,并对相关环节进行严格审查,如证据的可靠性、推理的逻辑性、结论的可重复性等,它使任何基于文献的认知实践皆成为可被检验、质疑、修正的公共知识生产过程。第三,社会科学视域中文献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将文献材料转化为系统性知识,并抽象为可验证、可共享并能融入现有科学体系的理论命题或规律性认识,从而实现从分散的文献材料到系统化、公共化的科学知识的本质性跃升。

在学科层面,方法论聚焦特定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学科本质属性及其与研究方法体系的互构关系,核心在于揭示研究方法在学科范式生成与演进中的建构价值。以叶澜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为例,其不仅剖析了教育研究对象与方法论的适配逻辑,更系统论证了学科知识生产的发生机制、方法论体系架构及认识论根基。研究方法既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提供方法论支撑,其选择本身亦反向形塑学科特质,形成双向建构的认知生态。这种互构效应在同种研究方式的应用差异中尤为显著,如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文献研究侧重文献特征与科研规律解析,典型方法包括共词网络分析、引文轨迹追踪及知识图谱建模;社会学视域下的文献研究则聚焦文本映射的社会关系结构,多采用深度内容分析、批判性话语解构等解释性方法。由此,学科语境成为研究方法价值取向与应用形态的深层规约力量。

(二)文献研究与研究范式

范式是研究者观察世界的思想窗口。一般来说,研究者观察到的社会世界是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的,研究者用自己特有的概念框架或范式来进行解释^{[10]168}。因此,持有不同范式的研究者对同一个社会现象会有不同的解释。艾尔·巴比认为,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明显的范式更迭,社会科学只有许多相互竞争的范式,彼此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受欢迎程度的变化,很少被完全抛弃。从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看,比较典型的研究范式分类主要涉及实证主义、阐释主义和批判主义3种。

实证主义从广义上来讲就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由于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确立了自然科学的权威地位,社会科学各学科竞相模仿自然科学来建构自己的科学体系,致力于探索社会发展变迁的普遍规律。实证主义主要有以下特点:坚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原则,强调知识的逻辑性、系统性和可验证;坚持归纳主义原则,认为科学知识的基础是经验归纳;坚持价值中立原则,研究者在研究工作中应做到避免个人思想或偏好的介入^{[10]172}。实证主义视文献为客观知识的储存库,进行文献研究的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收集可观测、可检验的经验证据,从而为“发现普遍规律”的认识论目标服务。研究者以价值中立原则筛选文献,严格区分原始数据与学术论述。事实上,实证主义与文献研究构成基于经验验证的知识累积链条。

阐释主义是一种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文本可以是书面文字、对话、图片和事件^{[10]175}。作为一种抵制实证主义的新范式,阐释主义强调详细阅读或检验文本,以解释隐藏在文本中的意义,对人们如何创造与维持他们的社会世界有所理解并给予诠释。在文本诠释过程中,研究者力图吸收或进入文本中的整体观点,然后形成对整体与各部分之间相关性的深刻理解,但每位读者也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主观经验带进文本。阐释主义将文献视为承载历史情境与文化意义的文本系统,主张理解本质上是研究者与文本传统展开的历时性对话。文献由此成为动态的意义载体,其价值不在于呈现固定不变的“客观事实”,而在于激发持续的意义协商与解释创新。从这个角度看,阐释主义与文献研究构成诠释学意义上的共生体。

批判主义是以批判理论为核心的哲学立场,其核心在于质疑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对知识的塑造。

持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学者通常坚持批判纯经验性和数量化方法,拒绝“价值无涉”,坚信理论知识的时代性和政治性,倡导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及其改造社会的作用,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解决“是什么”,而是解决“应该是什么”^{[10]176}。批判主义为文献研究注入本质性的批判意识,超越传统综述的描述性功能,要求解构文本背后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预设与历史语境。研究者不再被动梳理既有成果,而是主动质疑知识生产条件:何种假设支撑理论框架?谁的话语被权威化而何种叙事被遮蔽?文献如何成为社会权力关系的载体?这种批判性审视使文献研究转化为揭露知识政治性的解构实践。

(三)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文献研究”

在方法体系视域下,文献研究的范畴与意涵明显超越单一研究方法的操作性边界,其独特的研究理念、明确的价值取向以及多样且情境化的表现形式,共同构成其被定位为一种“研究方式”的内在依据。文献研究作为一种非介入性研究范式,其当代价值正随信息生态的膨胀而持续跃升,海量文献资源的指数级增长为跨学科知识发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证基础。该方法论的本质是对既有知识载体的回溯性开发,要求研究者在课题确立阶段优先评估能否通过已有文献重构研究问题或验证理论假设。文献研究方法论的优势源于独特的非反应性特征,因完全规避与研究对象的直接互动,既杜绝了干预性偏差,又保障了源数据的本真性,故被界定为间接研究或非接触性研究。

根据分类标准的不同,研究方式可以形成多种不同的划分体系,本研究仅从介入研究程度、研究的时间性、研究目的的差异3个维度进行探讨(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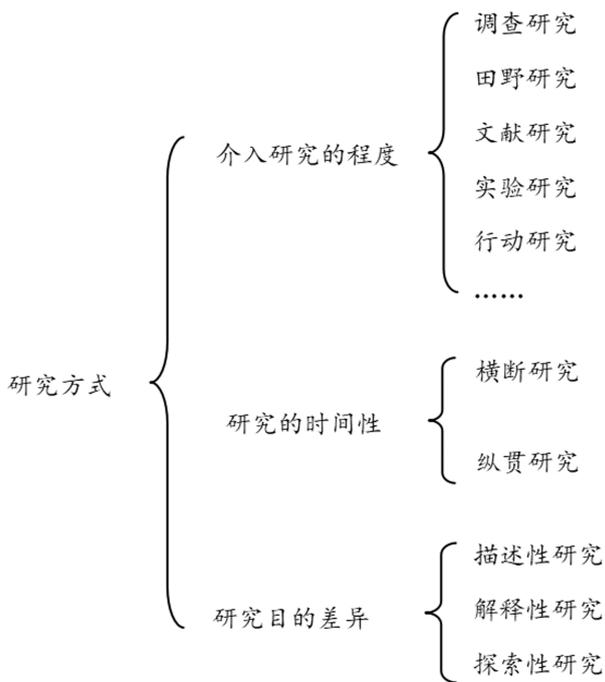


图3 不同分类标准下的研究方式

从介入研究程度看,研究方式可分为调查研究、田野研究、实验研究、文献研究、行动研究等。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资料收集是所有研究都需要经历的基本过程。人们普遍认为,研究人员应该在研究过程中收集(或创建)他们自己的经验资料,且收集资料的方式与研究特征紧密联系,呈现一种独特的研究思路。例如,调查研究基于样本收集资料,在严格的统计分析基础上推断总体特征;田野研究强调在自然的情境中实地调查研究,注重“即时性”和“在场感”。文献研究比较突出的特征是不直接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取研究所需要的资料,而是去收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形式为主的文献资料。文献研究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时间维度上的“不在场”,如借助历史文献资料对过去某个时段的人或

事进行研究;二是空间维度上的“不在场”,如借助现有文献资料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比较研究^[8]。

从研究的时间性看,研究方式可分为横断研究和纵贯研究。其中,横断研究也称为横剖研究、横向研究,指的是在某一时间点上,对社会现象或事物的“横截面”进行的研究。横断研究有助于分析和比较属于不同群体、不同阶层或具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程度等特征的研究对象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分布状况和特征。例如,有学者使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探究少数民族教育获得与不同层次价值观认同之间的内在关系^[36]。纵贯研究是在前后不同的时间里分别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调查,收集该社会现象在当时的资料,将这些资料结合起来分析,以描述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以及解释不同现象前后之间的联系。纵贯研究包括3种不同的类型:趋势研究、同期群研究和定组研究。例如,有学者采用纵向设计的方法,追踪40个分别来自混龄教育和同龄教育班级的幼儿,通过设置不同的助人情境,安排不同的受助对象,对比两种教育模式下幼儿的助人行为成绩及前后测成绩的变化^[37]。

从研究目的的差异看,研究方式又可分为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和探索性研究。其中,描述性研究的目的是呈现总体的结构、现象、特点等方面的信息,如有研究以近五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完成单位、完成人、合作情况以及内容主题分布等维度对高等工程教育领域的748项成果进行描述性分析^[38]。解释性研究是对所观察到的现象、问题或行为做出解释,其目的是将隐藏在客体背后的信息、意义和价值显现出来。例如,对大型文献纪录片《圆梦百年:中国义务教育百年纪实》的解释性研究就是通过纪录片去理解中国义务教育的历史价值、社会意义和发展规律^[39]。探索性研究适用于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其主要目标包括:发掘特定现象、问题或行为的作用范围及程度;针对该现象提炼一些初步的思路,或者检验对某个现象展开广泛研究的可行性。例如,有学者以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矿业工程学科为案例研究对象,采用“分阶段+分层次”二维分析框架,归纳案例大学所蕴含的世界一流学科的演进特征及发展逻辑^[40]。

由上述分析可知,不同的归类标准,会衍生不同的研究方式。上述3个归类标准仅体现了对研究方式观察视角的差异。尽管在同一归类标准之下,不同研究方式之间具有互斥关系,但在不同归类标准之间,不同研究方式之间可能是交叉或包容的关系,如文献研究方式既可能是纵贯研究,同时又属于解释性研究。

(四)基于文献的研究方法体系建构

尽管尚未有一本专门讨论“文献研究”方法的教材,但一部分社会科学类研究方法著作或教材中仍有对所谓的“文献法”的分类。例如,袁方主编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将“文献(研究)法”分为第二手分析、官方统计资料、内容分析;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将“非介入性研究”分为内容分析法、既有统计资料分析法、历史/比较分析法;杜泽逊在《文献学概要》中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分为校勘、注释、考证、编纂等方法。然而,上述分类的确反映了文献研究的间接性、便利性和无反应性特点,但也充斥着明显的“社会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色彩。同时,这种分类主要依据文献资料的来源差异,属于早期社会学家经验式的认知结果,并未反映整个社会科学有关文献研究的方法实践全貌,特别是近年来新出现的基于文献的研究方法实例。事实上,研究方法并不是哪一个学科领域的专有方法,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研究的公器。基于文献的研究方法必然要超越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的限制,从学术研究实践入手,总结概括当前社会科学各领域有哪些关于文献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可能是一个比较可行的策略。

1. 文献研究类型

从研究实践看,文献研究显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包含丰富多样的具体方法、技术与工具。

按照文献来源的差异,文献研究主要包括规范性综述、第二手分析、现存统计资料分析、档案和历史研究、政策研究5种类型。必须承认,这5种类型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重叠,如第二手分析所用到的可能是某一历史阶段的档案和政策资料,这不仅与档案和历史研究产生联系,也与政策研究相关,其区别在于研究目的的不同。然而,每一种文献研究方法都有属于自己的文献类型、倡导者和实践者,因此在强调它们密切关系的同时依然考虑它们是有意义的。

(1)规范性综述。规范性综述主要包括系统性综述和元分析。从已有研究看,系统性综述和元分析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不得不承认,还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方法,甚至在对一篇系统性文献综述论文的评审意见中指出:“综述类文章有综述类文章的写法,虽然本文在方法上有一定新意,但综述就是综述,无所谓系统不系统,也没有必要搞得看起来很学术的样子。”^①事实上,综述分为叙述性综述和规范性综述,其中,系统性综述属于规范性综述,且在方法层面已经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操作性。之所以出现如此滑稽的评审意见,一方面在于评审者基本学术素养的欠缺,另一方面在于学术界对文献研究的准确认知的广泛性不足。

(2)第二手分析。第二手分析作为一种别样的研究策略,其本质是对既有研究文献资料进行创新性再开发的过程^[41]。该方法通过对他人初始研究目的所收集的原始数据集进行深度挖掘,开辟了两种典型路径:一是问题转向型解析,即从现有数据中提取与原始研究命题相异的新学术问题;二是方法革新型验证,即运用前沿分析技术对历史数据进行再处理,检验原结论的方法敏感性及其效度稳定性。因此,第二手分析的研究重点放在大型数据集上,这些数据通常是大型研究团队、研究机构或国家层面精心收集的,可能来自一次性项目,也可能每年或定期收集一次。很明显,第二手分析的主要优势在于研究者不必自己收集数据——不仅节省了大量时间、成本和麻烦,而且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无论是独自工作还是在一个小团队中工作,收集如此庞大的数据集都是不可行的。

(3)统计资料分析。统计资料分析是对官方或权威机构发布的宏观汇总数据进行二次解析,旨在通过量化技术揭示社会现象的分布规律、演变趋势及变量间的关联性,为理论建构或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很明显,统计资料分析与第二手分析虽共享既有数据资源,但在分析单元层级上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操作对象为经预处理的宏观聚合指标(如频数分布、百分比结构等统计聚合形态),后者直接处理原始微观数据集。这种差异导致二者形成数据价值链的不同定位:统计资料分析处于信息整合后的解释层;第二手分析居于原始证据的再开发层。毫无疑问,我国最有价值的统计资料是由国家统计局编辑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诸如《中国社会统计资料》《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这样的分支统计资料——既包括各省份和主要城市的资料,也涉及不同年代的资料。这类文献研究必须说明所用统计资料的来源,对所用资料的各种注释、总体基础以及测量指标的确切类型等都要有明确的认识,如此才能确保较高的信效度。

(4)档案研究和历史研究。档案研究和历史研究可能听起来很像,而且它们在相当程度上重叠,但进行区分表述仍然是有价值的。不仅历史学家在开展研究时使用档案,将其作为主要数据来源,历史学家以外的研究人员也使用档案,这些档案收集和保存所有与学科相关的文献和数据,如学科史追溯。档案和历史文献已经成为相关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的主要资料来源,因为这些资料留下了人类过去活动的各种证据,主要有3种类别:一是官方文本,包括国家档案、法律文本、政府工作报告等;二是已发表的评论和报告,包括小说、电影、广告,关键政治、社会和文学人物的著作以及报纸等;三是个人文本,包括信件、日记、相册、自传和生活史等^[42]。在社会科学领域,档案和历史研究有着不可替代

① 这是笔者的论文《生态学理论何以赋能学科建设研究:一个系统性文献综述》在投稿某学术期刊过程中反馈的一个外审意见,此文后来转投至《中国高校科技》发表。

的价值。我们对现在的认识、对未来的希望和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认识。

(5)政策研究。在众多的文献类型中,政策文本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献形式,不仅具有较强的政策科学学科特征,还具有独特的文本结构。政策文本通常包括法律法规性、规范性和政策性文件3种基本类型,并有多种体例。政策一般被看作政治目的的表达,以至于所有的政策都涉及利益团体的表达、议程设定及其实施办法^[43]。因此,有关政策文本的研究是一个试图通过为行动者的决策和行动提供推理严密、证据为本、负责任的建议的方式来支持和说服行动者的过程^[44]。具体来看,基于政策文本的研究可分为3种类型:一是政策文本定量分析,最一般的表现是对文本中某些关键词的词频统计,重在描述文本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或特点,属于传统的内容分析;二是政策文本的定性分析,侧重政策主体、政策议题、政策目标的阐述,以及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及建议;三是综合分析,对政策文本既有定量描述也有定性阐释,甚至还有预测研究^[45]。

2. 文献分析方法和技术

文献研究类型的划分只是科学认识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从指导文献研究的操作性进程来看,还需要辅以关键的文献分析方法和技术。时至今日,有关文献分析的方法和技术类型多样,尚未形成体系化的归类 and 界定。结合研究范式的不同,本文将文献分析方法和技术归类为如下3种形式。

第一类是秉承实证主义范式的内容分析和文献计量。内容分析和文献计量虽同属基于文献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但在分析对象与认知路径上存在根本分野。内容分析最初用于传播科学,之后越来越多地用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是一种对明显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而系统的量化,并加以描述的研究方法^[46]。内容分析法延续了实证主义的分析立场,通过深入文本的内部意义结构,将话语、主题、符号等质性要素转化为可统计的范畴编码,旨在解码潜藏的观念框架、意识形态或社会语境,其核心是意义生产的微观解构。文献计量是以文献外部特征为研究对象,研究文献所隐含的科学研究的结构、特征和规律的一种定量研究方法^[47]。文献计量聚焦文献系统的外部关联特征,通过引文网络、作者合作、期刊分布等显性数据映射学科知识的结构与图谱,其本质是学术交流模式的宏观扫描。当前文献计量法已深度渗透情报科学、科学计量及教育研究等社会科学领域,成为驱动学科主题演进分析、知识图谱构建与研究前沿探测的核心方法引擎。随着计量工具箱的持续进化,以Citespace、BibExcel为代表的可视化分析生态,凭借其算法模块化封装与交互设计优化,显著降低了知识图谱构建的技术准入门槛,进而推动该范式向研究新生代群体的操作简易化进程^[48]。总体来看,两种方法在共享实证主义的规范性原则基础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或许在数字人文的融合趋势下,两种方法在论证逻辑上能够协同驱动文献研究从描述走向解释。

第二类是秉承阐释主义范式的叙事分析和文本分析。叙事分析与文本分析同属阐释主义研究范式,其分野根植于对“意义生成机制”的不同追问维度。叙事分析作为故事研究的理论化形态,聚焦人类经验世界的认知图式解析,核心任务在于识别并解构个体或群体通过口语、文字及多媒体呈现的叙事结构。该方法论植根于“叙事本能”的人类学预设,即故事不仅是表达媒介,更是存在方式的组织原则。其研究流程始于原始叙事采集,终于意义诠释的辩证循环,强调叙事素材与意义生成的互构关系。文本分析延伸至符号政治学维度,既解码表层语义,更揭示文本结构内蕴的意识形态与权力结构。其实践路径包含理论驱动与资料驱动两种形式,均需通过修辞策略解析与叙事架构解码,实现从语言表征到深层意义结构的升华。其方法论操作遵循四阶解构链:数据溯源—语料聚合—语义编码—批判性阐释,最终完成文本符号系统的权力祛魅。总体来看,叙事分析和文本分析虽共享深度解读的诠释学根基,但叙事分析法始终锚定“故事化”的表述结构,而文本分析法涵盖更广阔的符号实践,如从诗歌意象到法律条文,旨在剖析文本内部的意义结构。

第三类是秉承批判主义范式的言语分析。言语分析是一种批判性地考察语言如何在社会实践中

建构意义、权力关系与认知框架的研究方法。其核心命题是：话语并非传递客观现实的透明工具，而是动态生成社会现实本身的建构性力量。与文献研究的其他方法不同，话语分析的核心在于特别关注文献中的语言本身及其背后隐藏的社会规则和规范。例如，话语分析试图解释作者是在什么背景下写作的？他们想表达什么含义？文本是否涉及特定利益群体？文本中体现了哪些决策、权威或影响力？虽然话语分析最早起源于语言学，但随着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理论的融入，逐渐成为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工具^[49]。学者们常用社会文化视角的话语分析，关注在特定社会和历史情境下语言是如何被使用的、语言起到了什么作用、人们如何通过语言共同构建知识，以及语言在组织和促成集体思维活动中扮演的角色^[50]。

上述文献分析技术的划分，主要是基于认识层面的理论考量。在实际操作中，研究者可采用混合方法开展研究，特别是对同一批文献同时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这种“三角互证”式的技术路径，不仅有助于交叉验证研究发现、质疑单一方法的局限，更能融合宏观模式洞察与微观意义诠释，从而生成更为全面、立体且具有解释深度的结论^[51]。

五、“文献研究”的有效实施及其规范化操作

文献研究的有效实施主要涉及文献评估支持、文献研究设计以及文献分析过程3个关键环节，各环节的规范化操作内容如下。

（一）文献评估支持：系统考查文献本身所指及其外在社会关系

现存文献（特别是原始文献）一般是为研究以外的目的而撰写或编制的，在收集和使用之前必须对其价值进行评估，这决定着整个文献研究的有效性。一般而言，文献评估有4个标准^[52]。

1. 评估文献的可靠性和作者身份的真实性

在文献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最初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判定文献是原件还是副本。如果是副本，究竟是原件的副本，还是副本的副本？因为文献在复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入错误，或错误转录，或印刷污染，或部分缺失，特别是当原件尚未获取而副本之间又存在差异时，就需要研究人员通过专业的知识来实现“猜想修饰”，如可以通过适当的注脚及推论，重建符合逻辑的整体内容。在初步确定文献的可靠性之后，研究人员还需要核实负责创作文献的作者身份，即使文献上标有特定的作者，也需要进一步甄别和判定，如编辑或抄写员对作者的命名可能不正确，或被指明的作者可能是一个名义上的作者掩盖了一个团队或组织的贡献等。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判断词汇运用及创作风格来判断文献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从而提供作者身份的初步证据，但这通常必须辅以文献的外部证据，如对纸张的化学测试、笔迹的检查，以及文献中的事实主张及其观点表达的合理性判断等。

2. 判断作者的写作动机及作者与文献的关系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所有对社会事件的描述都是被“歪曲”了的客观事实，因为人们在试图描述社会现实时，总是有选择性地强调某一个或几个方面。所谓可信度，主要是指文献内容可能有多大的扭曲程度，涉及观察者在选择观点和试图从所选择的角度记录准确事实方面的真诚程度。对于个人文献来说，评估真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文献作者对文献内容的物质利益的追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寻求可能涉及欺骗读者的实际利益。对于官方文献来说，文献本身是基于一种政治利益，即提出一种观点而不是另一种观点，将宣传转化为组织选择特定行动的合理性论证。因此，研究人员必须试图分析文献事实与文献创作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参与事件的程度，以及作者是否存在不真诚的理由，并尽可能在分析文献时秉持一种“不信任”的立场，以进一步提高文献使用的质量。

3. 评估有关文献的保留程度和可用性

文献要想长久存续，就必须被安置于某个物理或制度性场所。这可能是通过实体出版来实现，也

可能是被系统地收藏于公共或私人档案机构,抑或只是简单地、非正式地存放于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文献都能够存放以保持其可用性,相当多的重要文献已经被有意或无意销毁,如文献过于敏感而进入碎纸机,或保存失当而物理老化变质,或通过错误归档而失踪,这在客观上对相关主题文献的代表性造成不良影响。为了对特定文献集合的代表性作出判断,研究者首先必须了解可能产生的相关文献的数量和类型,如可以先形成一份文献的目录或索引,然后根据现有文献的分布采取抽样策略,获取一个在理论和经验上有意义的文献样本,这可能会有效提升文献的代表性。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虽然所有科学研究都涉及事实的“构建”过程,但使用代表性的文献可能涉及这样一种可能性:文献构建的“事实”,很可能仅仅是文献自身选择性存续与偶然性留存这一偏误机制的产物。

4. 准确把握文献字面意思及其文化意蕴

当研究人员开始解读文献的文本意义时,客观上需要经历从作者的预期表达到受众理解的意义转化过程。文本的预期内容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研究者需要结合字面意思准确翻译其本意,并结合社会文化背景为受众提供更为确切的含义^[53]。在文本解释过程中,通常存在两种解释立场:一种是解释学传统,即总体上把握特定话语中各种概念相互关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进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建构文本的整体意义;另一种是符号学传统,认为文本的信息体现在构建整个文本的“规则”系统中,从语词出现的频率、语词结构、语词顺序等方面客观定量地呈现其语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文献的解读逐渐呈现解释学与符号学传统相互靠近的趋势,即利用各自的优势综合判定文本的含义。

(二) 文献研究设计:按照规范的社会科学系统设计操作化流程

研究设计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工作的总体规划方案,对整个研究工作起着引领和决定性作用。任何基于文献的研究设计都是一个创造性过程,需要将研究问题的解决路径转化为一系列具体的途径、策略、手段和决策,并说明如何进行有关文献的分析和探索^[54]。鉴于文献类型及其研究任务的不同,研究设计方案也呈现显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者的知识观、解决问题的视角、方式和思路上。因此,学术研究的关键在于制订或选择一个缜密的研究设计,以确保整个研究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从而有效引导研究者按照研究蓝图完成研究任务。作为研究过程中最基本的规划,文献研究设计主要包括研究策略、方法和技术、资料收集3个问题。

1. 研究策略的系统架构

研究设计遵循的逻辑就是研究策略。作为研究设计的重点,研究策略因研究取向的不同而不同,即不同的研究取向有不同的研究策略。一般来说,研究策略的表述往往以一种简要概述的方式表明总体的研究思路,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要清楚表明所在研究中的文献观,如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将资料视为新的事实,即新知,做学术研究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55]“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56]。在其他类型的文献研究中,可能仅仅将文献视为被分析的对象,其创新在于文本的内在结构及其社会文化意义。二是要清晰地表述基于文献回答问题或验证理论的思维推理过程,主要涉及确定的文献范围和研究对象、采用何种研究范式、分析的关键问题、最终指向的研究目的等方面。三是要可视化呈现各研究环节缜密的操作流程,着重从文献分析的理论工具、分析单位、内部结构关系等方面构建逻辑框架,进而在总体上构建推进整个研究持续深入的行动指南。

2. 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运用

每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都暗含各自的研究范式,且具有各自的特点和适宜解决的问题范畴。方法和技术没有等次之别,只有是否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差异。应该说,只要是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术都是好的选择。因此,究竟运用何种方法和技术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且极具灵活性的思辨与决策过程。在文献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说明中,有相当多的实证研究往往采取“定义式”介绍

方法的方式,其粗浅的表达暗含对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来龙去脉领会不准确、不深刻、不到位等问题。因此,一个好的文献研究设计,不仅要求研究者要清楚明了所选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基本知识,包括该方法的兴起和发展背景,有几种方法变体,以及在运用过程中如何选择,还要对方法和技术所蕴含的认识论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如很多研究者在运用文献计量法时就简单地唯“计量数据”进行单一描述,并没有意识到文献计量法是通过作为第三世界的文献来认识作为第一世界的物质实践世界、作为第二世界的逻辑思维对物质世界的解释与建构的重要作用^[57]。应该说,有相当多的文献计量研究成果存在解读偏差,其原因在于研究者对文献增长规律、引文分析、共词分析、知识图谱等方法的基本原理缺乏系统把握。

3. 资料 and 数据的收集整理

交代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和数据是所有研究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一般而言,在文献研究设计中,有必要清晰地表明该研究涉及哪几类资料和数据,不同类型的文献遵循何种收集策略,以及检索之后对资料 and 数据的筛选与清洗工作。具体来说,第一,全面、丰富的资料和数据有助于还原事实真相,深入分析事物的来龙去脉,它决定了整个文献研究的质量。研究者必须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力收集与研究主题有关的所有资料和数据。例如,从研究问题出发,充分拓展文献资料 and 数据的来源;在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纳入新发现的资料和数据;分析资料时及时补充必要的资料和数据。第二,资料的全面性需要切实可行的收集策略来保障,这需要研究者清楚了解不同类型的文献来源,如历史和档案文献需要到各个国家的历史档案馆或私人档案馆查询,而学术文献则需要依赖中外文献数据库的检索。此外,还应注意从一些额外渠道获得的灰色文献,即通过专门渠道而获得的开源材料,如科技报告、会议记录、内部刊物等灰色文献以及国防外交等智库情报^[58]。第三,当文献资料和数据足够丰富且属于连续性的报纸、期刊、视频等文献资料时,有必要选择合适的文献范围作为文献研究的分析对象,对现有资料和数据进行初步的筛选和清洗,剔除形式相关但内容无关的资料和数据,同时选择合适的抽样方法选择文献样本。

(三) 文献分析过程:综合运用理论、实践和新兴技术探索新知

尽管文献研究设计规定了缜密的操作流程,但文献分析涉及理论、实践、方法的融会贯通和逻辑推理,其复杂的知识生产过程仍然需要大量的学术研究“隐形经验”来提供支持。然而,从当前的著作和方法类教材来看,很少见到有关文献分析过程的经验描述及其深度剖析,大多数学者仍然坚持用“黑箱”来隐喻其复杂性。文献分析不仅仅是对文献材料 and 数据的一般性描述,还必须综合理论、实践和新兴技术探索文本结构,超越理论验证的传统思路,在发现新概念、提出新命题、建构新理论等方面大胆探索。

1. 恰当运用理论工具使文献分析更具学理性

理论工具是用于分析、解释和理解现象、问题或数据的一套认知框架、概念体系或方法论。反观当前的研究,大多数文献研究成果突出文献事实有余而理论切入不足,导致学术界对文献研究成果的认可度不高。恰当运用理论工具开展文献研究,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构建研究视角和指导研究过程,还有助于提升解释文献分析结果的学理性。第一,因为理论工具的介入,文献研究才能突破浅层次“经验描述”的局限,进而成为具有学理和逻辑的知识生产过程。第二,理论具有很强的“透视”作用,可以帮助研究者从宏观层面把握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例如,有研究基于教育变革中的教师情绪理论,从地点维度、社会性维度、时间维度3个方面对浙江省新高考改革情境下的高中教师情绪进行叙事探究,从整体上把握了教师个人叙事与改革叙事的良性互动机理^[59]。第三,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具体问题,并为研究提供系统的逻辑基础。例如,有研究基于角色理论,对100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事迹材料文本进行内容分析,从卓越教师的角色行为和角色观念入手,绘制了卓越教师的多元角色

形象图景^[60]。可见,高质量的文献研究需要以理论为脚手架,通过独特的视角切入、逻辑推理验证和创新性整合,使文献分析成为建构新知识的学术实践。

2. 紧密结合社会实践来论证文献研究主题

文献研究者不是直接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而是通过文本来分析研究对象的行为特征。事实上,恰恰是这种非介入性特征的存在,才使得文献研究者更加倾向文本内容的规范性分析,从而忽略了研究对象在不同社会实践阶段的动态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献研究成果的质量,导致学术界逐渐对基于文献的研究缺乏认可度。当然,文献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脱节并非必然,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实践导向意识。首先,文献研究者要清楚地认识到文献分析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的价值,这种融合无疑是知识生产从“书斋”走向“田野”的范式革命。通过构建文献与实践的比较对照机制,既能提升文献研究的现实价值,又能增强社会实践的科学性,最终推动社会问题的系统性解决。其次,文献研究者须具备必要的实践品质,包括改造社会实践的担当、接触社会实践的主观意愿和感悟社会实践的能力,通过培养这些实践品质,研究者能够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再次,文献研究者在选题和论证过程中要有意识地进行田野调查和实地研究,确立文献分析的历时性比较框架,动态追踪社会实践与文献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必要时,还可将文献研究成果进一步转化为政策建议或操作手册等实践改革成果。

3. 关注数字化文献形式并引入新兴分析技术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学术研究的背景下,文献研究正经历从传统纸质文献向多模态数字文献的范式转型,如交互式平台产生的海量文本、XML 结构化数据,以及文本、音视频、交互式图表三维集成的增强现实文献类型等。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文献获取和处理方式,更催生了全新的研究维度与方法论体系,如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LDA 主题模型等。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能够准确运用传统文献研究方法的同时,深刻领会文献研究的核心逻辑,直面新型文献类型的挑战,突破传统文献范畴,灵活融入新兴分析技术开展混合研究。例如,有研究以在线开放课程“教育学”在哔哩哔哩网站上所装填的弹幕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混合研究方式,利用 Python 软件对网站的弹幕进行爬取分析^[61];还有研究从官方网站和媒体报道中获取与“教授”相关的语料,用量化内容分析软件 KH coder 和质性分析软件 NVivo 对数据进行编码分析,进而建构媒体对“教授”身份的话语策略^[62]。可见,当前和未来的文献研究需要同时具备“技术敏感度”和“学术判断力”双重能力。这种技术赋能与人文思考的辩证统一,将推动文献研究进入智能增强的新纪元。

六、结 语

综观而言,阐明“文献研究”的是是非非是一场执着且超然的冒险之旅。这不仅因为方法论议题常与学术研究热点存在明显的关注度差异,更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研究立场既需要勇气,又必须准备接受学术共同体的持久审视。应该说,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学术界有关文献研究的方法之惑,为学界全面认识作为研究方式的文献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范本。方法体系视域下的“文献研究”建构思路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不仅超越了具体“研究方法”带来的认知束缚,还呈现了“研究方式”的定位合理性和包容性^[63]。基于此,提出以下3点展望。

其一,研究方法是学术公器,建议开展文献研究“元研究”。研究方法是学术研究的公共基础设施,其准确性与可靠性关乎知识生产的整体质量。呼吁并建议娴熟运用文献研究具体方法的资深学者,投身于研究方法的“元研究”,这包括对各类文献研究的哲学基础、适用边界、操作流程与效度标准进行深入反思与系统提炼,旨在为学术界提供更为精准、有效的方法论指导、清晰的技术规范与实用的工具支持,从而夯实学术研究的质量根基。

其二,将文献研究的方法体系融入人才培养过程,筑牢学术训练的基础环节。文献研究以其非介入性、可重复性及对历史纵深把握的特性,在诸多研究场景中展现出独特的效率与价值。它不仅是学术创新的起点,更是训练研究者逻辑思维、批判性阅读与理论整合能力的关键。建议在普遍开设的“研究方法”“学术写作”等课程中增设“文献研究”模块,或专门开设“文献研究”课程,通过系统教学,推动青年学人能够准确理解并灵活运用这一研究方式。

其三,有组织谋划文献研究方法论及操作规范的教材和著作。为破解文献研究在学术界面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一悖论局面,要汇聚学界智慧,撰写一批高质量、兼具理论深度与操作导向的文献研究方法专著、教材或操作指南。唯有通过持续的集体探讨与实践积累,才能推动文献研究的知识体系从零散走向系统,最终形成一个从方法论哲学到具体方法技术、层次分明、开放动态的完整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 [1] 杜晓利. 富有生命力的文献研究法[J]. 上海教育科研,2013(10):1.
- [2] 周树智,韩凯峰. 研究生应掌握的八种研究方法[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9):2931.
- [3] 童星. 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特点及变化趋势——基于2005—2014年379篇博士论文的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2015(9):5357.
- [4] 姚计海.“文献法”是研究方法吗——兼谈研究整合法[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7):8994.
- [5] 文献法,是真实存在的“研究方法”吗? [EB/OL]. (2021-10-28) [2025-09-10]. <https://zhuatlan.zhihu.com/p/426633825>.
- [6] 对不起老师,我的论文用了“文献研究法”[EB/OL]. (2020-03-26) [2025-09-10]. https://www.sohu.com/a/383251107_119350.
- [7] 肖军. 教育研究中的文献法:争论、属性及价值[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10(4):152156.
- [8] 丁瑞常,曾芯怡. 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文献法:误解、误用与规范化[J]. 比较教育研究,2024,46(11):1322.
- [9] 林杰,张欣琪,刘业青. 文献研究法的价值、问题与改进——基于我国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分析[J]. 比较教育研究,2025,47(4):312.
- [10] 蒋逸民. 社会科学方法论[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 [11] 姚喜双,王钰. 文献分析法是研究方法吗——基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旧问新答[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8(1):133142.
- [12] 夏国强.《论语·八佾》“文献”礼源考[N]. 光明日报,20190810(11).
- [13] 何晏. 论语注疏[M]. 邢昺,疏.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36.
- [14] 汪宇. 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38139.
- [15] Schuermeyer W. Aufgaben und methoden der dokumentation [J]. Zentralblatt Für Bibliothekswesen, 1935 (52): 533-543.
- [16] Dupuy-Bries S. Qu' est-ce que la documentation? [M]. Paris:Éditions Documentaires Industrielles et Techniques, 1951:7-15.
- [17] Duykvis F D. Normalisatie op het gebied der documentatie: standardization in the domain of documentation [M]. The Hague, Netherlands;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Documentatie en Registratuur,1942:87.
- [18] Ranganathan S R. Documentation and its facets [M].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1963.
- [19] Oulet 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selected essays [M]. Amsterdam:Elsevi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Documentation (FID),1990:197.
- [20] Buckland M K. What is a “document”?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1997,48(9): 804809.
- [21] 李润洲. 研究生思辨写作的内在逻辑——一种教育学的视角[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7):712.
- [22] 褚峻. 从信息资源管理到知识资源管理——兼谈面向21世纪知识信息管理的高层次人才培养[J]. 图书情报工作,2001(3):4447.

- [23] 马费成,陈帅朴,陈景龙.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J].图书情报知识,2025,42(2):621.
- [24] 李泉鹰.文献综述:学术创新的基石[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9):3841.
- [25] 张斌贤,李曙光.文献综述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撰写[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1):5963.
- [26] Madhukar P, Mcculloch M, Gorman J D, et al.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an illustrated, step-by-step guide[J]. Natl Med J India, 2004, 17(2):8695.
- [27] 游景如,黄甫全.新兴系统性文献综述法:涵义、依据与原理[J].学术研究,2017(3):145-151,178.
- [28] 毛良斌,郑全全.元分析的特点、方法及其应用的现状分析[J].应用心理学,2005(4):354-359.
- [29] 蓝志勇.也谈公共管理研究方法[J].中国行政管理,2014(1):5964.
- [30] 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M].周海涛,史少杰,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3.
- [31] 陈向明.质性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
- [32]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邱泽奇,译.11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5.
- [33] 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重排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921.
- [34] 凯利·E.豪威尔.方法论哲学导论[M].宋尚玮,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2328.
- [35] 周文骏,杨晓骏.文献的属性、现象和本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7682,120.
- [36] 李晓菁,田志鹏.少数民族教育获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J].民族教育研究,2023,34(4):99107.
- [37] 李占星,牛玉柏,胡瑛.混龄教育对幼儿助人行为的促进作用——来自纵向研究的证据[J].应用心理学,2014,20(1):3239.
- [38] 蔺亚琼,刘雨心,谭晓晖,等.高等工程教育领域教学改革特征、趋势与反思——对近五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描述性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6):163-169.
- [39] 程方平.了解义务教育,才能办好义务教育——观大型文献纪录片《圆梦百年:中国义务教育百年纪实》有感[J].教育科学研究,2018(7):9596.
- [40] 武建鑫,蒲永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如何形塑世界一流学科——基于单案例的探索性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21,9(6):2740.
- [41] Heaton J. Secondary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an overview [J].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 2008, 33(125):3345.
- [42] Purvis J. Using primary sources when researching women's history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J]. Women's History Review, 2006, 1(2):273-306.
- [43] Codd J.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1988, 3(3):235-247.
- [44] 安·马克捷克,林恩·马库斯.如何做好政策研究:讲证据、得人心、负责任[M].李学斌,邹宇春,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3.
- [45] 陈学飞.教育政策研究基础[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299.
- [46] 杨小微.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38.
- [47] 陈维军.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的比较研究[J].情报科学,2001(8):884-886.
- [48] 马小燕,郑晓齐.高等教育文献研究范式的嬗变、问题及反思[J].高教探索,2019(8):3743.
- [49] 柴少明,李克东.话语分析—研究 CSCS 中协作意义建构的新方法[J].现代教育技术,2009,19(6):7982.
- [50] Mercer N, Littleton K, Wegerif R.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processes of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ve activity in computer-base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J]. Technology, Pedagogy and Education, 2004, 13(2):195-212.
- [51] Oleinik A. Mix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triangulation at work [J]. Quality and Quantity, 2011, 45(4):859-873.
- [52] Monageng M. The use of documentary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J]. Af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Revue Africaine de Sociologie, 2006, 10(1):224-230.
- [53] 张乾元,赵阳.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研究方法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3(14):163-172.
- [54] 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M].2版.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81.
- [55] 中国昌,周璇.中国教育史研究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内涵及路径[J].教育史研究,2024,6(4):1727.
- [56] 沈卫荣.何谓“历史语言研究”?——重读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24,61(5):94105.

- [57] 陈悦,陈超美,胡志刚,等.引文空间分析原理与应用:Citespace实用指南[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3.
- [58] 黄晓斌,丁孟思.兰德公司项目研究的信息来源分析——基于2010—2019年有关中国问题研究报告的引文调查[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2):204-207.
- [59] 黄亚婷,刘浩.新高考改革中的教师情绪:基于情绪地理学的叙事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20,49(4):85-105.
- [60] 王梅,杨鑫.角色理论视域下卓越教师形象研究——基于100位教书育人楷模事迹的内容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2020(5):30-36.
- [61] 沈浩,梁莹.在线教学有效策略探索——基于哔哩哔哩网站在线开放课程“教育学”的弹幕文本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22,43(11):69-76,84.
- [62] 刘文字,毛伟伟.“教授”集体身份在报纸媒体与微博中的话语建构差异[J].现代教育管理,2017(9):70-74.
- [63] 武建鑫,魏丽娜.超越研究方法的束缚: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文献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4(2):12-20.

(责任编辑:杨慷慨 张海生 校对:张海生)

Rationality and Repositioning of “Document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Wu Jianxin¹, Wei Lina²

(1. School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710021, China;
2. Institute of China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document resear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academia as a basic research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ts methodological connotation still lacks clear theoretical definition and paradigm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legitimacy of its theory, and the relevant methodological debates continue to arouse the deep attention and critical dialogue of 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s, which reflects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thodological system of “document research”. Existing studies have denied the rationality of “document research” as a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paradigm and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n proposed the “research synthesis methods” from a constructive perspective, which is regarded as a feasible solution for literature review. However,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 relevant judgment and its argument lack a 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literature”, equating “document research” with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clud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 in the judgment criteria, so as to judge that “document research” is not valid, which seems biased. Based on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scientifically and clearly understand the basic position of “document research”, trace the connotation and expression of “WENXIAN(meaning literature)” from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contexts, objectively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ole of document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use “document research” to refer to document-based research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responding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document research, and then discuss the methodology, research paradigms, research modalities,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of document research from the methodological syste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ntent of document research obviously exceeds the operational norms of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intervention, non-reactivity and convenience. In research practic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literature research needs to be supplemented by document research design, document evaluation support, and three-dimensional support for three key links of the document analysis process.

Key words: document research; research paradigm; research metho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 system